

行动者的鲁迅与自由〔*〕

胡梅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鲁迅是一个力图用思想文化改造国民的思想家,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除了用他的笔形成文学这种书面形式外,其最看重的是他的文字所带来的反响和行动上的意义。人们可以从他的语言中感到一种想改变想行动的欲望,也即鲁迅提倡的活的语言对于读者产生的活的效应。鲁迅一生都在呐喊,其言语昭示着一种行动的趋向,他一直崇尚一种可以让你动、你想动的思想。鲁迅在行动上是以永不停歇地进取、行走来化解人生的终极意义状态“虚无”。对于鲁迅来说,写作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一种需要,一种验证自己活着的倾说的形态。

〔关键词〕动的文字;欲行动的思想;行走在路上的“过客”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2.014

一、动的文字

鲁迅是一个力图用思想文化改造国民的思想家,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除了用他的笔形成文学这种书面形式外,其最看重的是他的文字所带来的反响和行动上的意义。鲁迅的内心虽有疑虑,有虚无绝望,可是他的行动的语言是坚决的;对于未来虽然不敢确定哪一条路是正确的,但他对于旧的道德文化的批判是坚决的。那么他表现出的语言就是凌厉和带着行动意识的,人们可以从他的语言中感到一种想改变想行动的欲望,也即鲁迅提倡的活的语言对于读者产生的活的效应。本节主要着重于从两个方面来阐释。

(一)激进的“动”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对于白话文的维护可以说到了极端的地步。陈独秀认为“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1〕}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国语白话文学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以此确证白话文学的合理合法性。提倡白话文就是提倡用活的语言活的思想表达现在,将中国变成一个生机有声的中国。鲁迅甚至认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2〕}把白话文与民族生存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见白话文对于鲁迅那一代新

作者简介:胡梅仙,文学博士,博士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研究”(15FZW059)阶段性成果。

文化运动者的意义。他们把白话文提到民族生存的高度,不是把白话文运动仅仅看作文字改革,而且看作是一种新的思维、思想,一种真的、活的声音的表达方式。

“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3]是因为语言的难懂、与民众脱离,使人们之间不能相互理解,所以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鲁迅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归结于语言的不能大众化和其中思想的腐朽,鼓励青年说出新时代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才是有活力和行动力的,而不是用僵死的陈腐的古文言。鲁迅曾说过是因为“我看中国的将来会变成阿拉伯沙漠。所以我才战斗”。^[4]这种“沙漠说”来自于鲁迅对过熟、死寂的民族文化的忧虑,而鲁迅认为能传输新文化的途径当是白话文,同时他也意识到“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5]所以后来他们就提倡思想革命。当鲁迅看到俄国歌剧团到中国演出,中国兵士麻木庸俗的反应时,他曾感叹:“是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6]沙漠似的中国,只有兵们在演员接吻时的拍手,致使鲁迅只有对于这沙漠的反抗之歌,而同情于何以要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的俄国歌剧团。

中国人历来喜欢安于现状,闻“革”必变。“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7]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就是这一记鞭子,能把中国人打醒。而且他相信这鞭子,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迟早会到来。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事,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决心,使鲁迅一生成为反传统文化、揭露时弊最坚决的一个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8]

当时,五四运动高潮已过,一些学者走进研究室,提倡整理国故,文化界出现一股复古思潮。

鲁迅对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事业,仍然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行继续摧毁旧的文化、掀翻吃人者的人肉筵席的使命。鲁迅把读中国书比作杀人没知觉的“软刀子”,担心中国将会在老调子中唱完,提倡一种在中国的行动,要让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说出真话,有声音有生气的中国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灵性的中国,只有在这样的人国的基础上,中国才能是有生机有希望的。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9]王富仁认为“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这即使不是鲁迅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最深刻的话之一”,^[10]“我活得年岁越多,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孔乙己,到忘乎所以的时候,则像阿Q。”^[11]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劣根性的深刻解剖。鲁迅也曾说过他身上有阿Q的影子,阿Q决不是死去的、过时的,他今天仍然表现在很多人的灵魂中。像鲁迅、王富仁那样时时刻刻严厉解剖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承认自己身上有阿Q、孔乙己的影子,可想而知,阿Q的深刻典型意义就在于挖掘了我们灵魂中懈怠松弛、自我蒙蔽等本质,而且阿Q具有人类性世界性。鲁迅的文字是动态的、热血的,让你想行动起来,而不是让你沉寂下去,看了他文字的人会回到现实中,而不是走进象牙塔里。所以说,鲁迅的文字包含着灵性、热血、催人行动的意向。他从不作无病呻吟的词句和篇章来充斥作品,减少作品的意思传达力。“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12]我们经常从鲁迅作品中可以感到鲁迅文字的跳动的脉搏,行动着的欲望。鲁迅反对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就在于传统中庸思想里的不思改革的惰性。“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3]因为直觉,所以行动。凡事如果用中庸之道去看,估计就没有行动的欲望和伟力了。虽然鲁迅曾说自己是凡事都要想想的人。在鼓励别人做无谓的牺牲时,鲁迅是犹豫的迟疑的,但对他自己,他虽

也“装死”“蛰伏”，在必要关键的时刻，他仍然会用他的笔发出自己的愤慨不平之音和用实际行动来践履自己的人格、尊严、理想。

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4]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事件使鲁迅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态度。鲁迅深知国人的惰性，他是用激进的政策来巩固新文化的成果，以使中国文化充分吸收外有文化，扫除沉积在国人心中传统文化痼疾，让中国获得一种崭新的有活力的文化。当初如果不是提倡用罗马字母代替汉字，白话文不会得到顺利推广。把中国的象形汉字改革掉，这对于一些与汉字有着深厚情感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1925年7月11日，反对白话文的《甲寅周刊》不是复刊了吗？不过那时的《甲寅》已成不了势了。针对《甲寅周刊》的复刊，鲁迅说过：“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讪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15]“不读中国书”固然是鲁迅守护新文化成果的一个策略，但鲁迅也承认这确实是自己用苦痛换来的真话。“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16]“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17]胡适也曾经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

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18]可见新文化的提倡者深知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他们知道唯有以激进的策略，才能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巩固扩展新文化的成果。鲁迅曾对唐弢说：“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19]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仍然是真知灼见。谁说鲁迅先生真正地全部摒弃古书呢？不读中国书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策略或者说是愤激之言，是因为鲁迅先生深刻地意识到古书里的旧思想对于中国人灵魂的毒害之深。

这种动的文字在某些时候也可称之为叫喊文学，就像鲁迅所说：“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20]这叫喊就是鲁迅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自觉的直觉的反应，不是经过理智过滤的叫喊。当有理智的时候，恐怕就无人叫喊了，世界就很太平，中国就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了。叫喊的文字虽来自于切肤之痛，在鲁迅那里却没有粗糙之笔，更没有恐惧和辱骂。还有一种是颠覆腐朽僵尸的文字，颠覆性的否定力量是动的力量，这来自于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彻底的批判精神。鲁迅曾呼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21]鲁迅的批判性文字不啻是旧文化旧道德的恶声，更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22]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

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23]捣乱鬼专与专制压迫捣乱,那股韧劲好似天津的青皮,猫头鹰发出的声音是毒泉的声音又为人所不乐见,但中国唯有这样韧劲的坚持和抵抗才会有声的中国。让中国从无声变成有声,需要青年的言语和行动,这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行动并产生作用的过程。鲁迅要青年不必“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24]这里的“现代的活人的话”不仅指用白话文,还包括现代的思想。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秩序是:“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25]等到自己翻身不做奴隶时就要别人为他做奴隶了,而且一级一级各自等级分明,每一级有每一级的规矩,不能逾越半分。当年的媳妇好不容易熬成婆,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厉害。“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26]中国的佛、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而儒家又是安于现状不能动弹一点的僵尸的乐观。须知,青年“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就会“变成一个呆子,——糊涂的呆子”。^[27]中国的文人习惯于万事闭眼睛,专门制造出瞒和骗的文艺,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和不敢正视现实,最终他们制造出的文艺不是“中状元”“谐花烛”的虚伪梦幻老调,就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28]倘中国人还要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中国的文艺仍会是死的,哑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时代的声音。”^[29]鲁迅相信“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30]鲁迅的语言来自于活生生的现实,也会给活生生的现实以指导,他把传统的文化糟粕、现实的弊端暴露出来,警醒国人不能再做奴隶,也不要去做奴役别人。只要有活的青年,活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必是有希

望的。

(二)说,未尝说尽与不说

鲁迅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即使是在国民党文网最密的时候,他也变化着笔名与一切恶的势力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但是他有时也有着“未尝说尽”和“不说”的苦衷。“未尝说尽”主要是因为言论的不自由,有时是鲁迅自己也不甚明了或怕全部露出自身血肉之故;“不说”,主要是不敢说,不敢说是因为政治高压,“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31]鲁迅对社会的发言基本处于这几种状态之中,他自己也深有体会:“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32]不敢说,没有自由说;不愿说,不重要或者不关心;不肯说,明知道,却不说,这表明他还是关心了此事或者说此事较为重要,引起了他的关注,只是不肯说而已;无须说,没有必要说,事较重要,他也很关心,只是不必说,既包括自己不想说,也包括听众不必需要你去说。

鲁迅曾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33]鲁迅的文字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凌厉的真话了,他被他的论敌称之为“刑名师爷”“刀笔吏”“土匪”“学棍”等。鲁迅自己也说:“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34]让语言起到一种剥皮的作用,这也是为被欺侮者和自我的申诉。用笔保卫自己的尊严,保护弱者的利益,让所谓的“公理正义”“正人君子”“温良敦厚”“流言公论”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最有意味的是,当初鲁迅支持国民党时,那些正人君子们还在军阀的名下做帮忙事业,等到他们转到国民党名下时,鲁迅已在骂国民党了。所以,鲁迅说,公理是可以转移的。“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

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35]这段话幽默风趣,形象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性,同时也印证了鲁迅的那句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36]那些正人君子跟着胜者也即是王者走,他们所扮演的还是旧中国士大夫帮忙帮闲的角色,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只是跟着“新的战胜者”,却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反对胜者,最多也不过是做一个王者师。结果,正人君子们又一次获得公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7]原来,公理是属于战胜者和依附战胜者的。鲁迅深刻地看到了强者凌辱弱者的历史以及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的懦弱、卑怯和虚伪。怪不得鲁迅发出“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38]的哀怨之声了。

鲁迅虽然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可却不是为了泄个人私愤,乃是出于对某一类典型或某一种文化、道德伦理倾向的批判。就像瞿秋白所说,“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39]

鲁迅又何尝将话说尽,除了政治高压,一是他担心自己思想不成熟,又不知正确与否,怕传染给了那些做着美梦的青年;二是他内心深处的黑暗来自于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深刻解剖自省。中国文人不习惯反省自己,更不敢正视自己、挖掘出自己灵魂的深来,而鲁迅却常常将自己置于这种无可逃避的境地,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这是一个咀嚼啃噬自己血肉的痛苦的灵魂,让自己鲜血淋漓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他还不是那么无所顾忌,因为他不知末路会怎样,不知人们又该怎样

地看待他称呼他?这也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的孤独。每一个时代的先驱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被人误解、非议、进攻,也会受到追捧和崇敬。这就是先驱者的境遇,唯有立定心志并且有舍身饲虎的精神才能挺受艰难,不屈前行。社会远比文学表现的更丰富更复杂更不可思议。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鲁迅针对读者提出的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终于受到大团圆的结局有这样的回答:“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40]阿Q的境遇既包含着作者的同情,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提醒。即使作者对阿Q的结局再残酷一点再戏剧化一点,都是允许的。文学需要一种艺术的真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也正是国民精神的一面镜子,中国民族倘不知自省,将会比阿Q更自欺、境遇更悲惨。

到底是说与不说,还是敢说与不敢说,鲁迅也曾意识到:“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41]自己能否毫无顾忌地说话或者是否愿意毫无顾忌地说话,这样的日子不知是否有?如果有,是说还是不说呢?毫无顾忌地说话其实倒还对得起这样的青年。鲁迅在犹豫他是否应该毫无顾忌地说话或者时局是否能让他毫无顾忌地说,他在《答有恒先生》中说:“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42]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43]一是对青年的失望,对进化的乐天的思想的幻灭;二是对于呐喊的疑惑,这种疑惑

是早在《新青年》写作时期就有的,现在是更感到自己不过是帮着排吃人的筵席的弄敏了青年的感觉的毒杀者。很多时候,鲁迅又何尝将话说尽,即使说出,也会不给发表。在广州时,他“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44]“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45]这还只是国民党布置文网的开始,此后吞吞吐吐的话,被删的话,不敢说的话,甚至于举家到处避难,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可以说是白色恐怖随时都笼罩着他们全家。他曾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以中国现状看来,无法写。最近适应社会的需要,写了些短评,因此更不自由了。”^[46]此外,在鲁迅自己来说,他也未必将自己的血肉全部露出。可是,遮遮掩掩地说,对得起那带着青年体温的钱吗?只怕说出来的苦痛的思想毒害了青年或者未说出的隐瞒的思想于青年是一种不坦诚。这就是鲁迅说与不说,说尽与不说尽之间的矛盾。“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沈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47]

鲁迅在写于三·一八惨案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沉重地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48]青年的血已经让鲁迅出离愤怒了,他感到了自己的笔的无力,对付枪弹屠刀的残忍,只是呻吟着、控诉着、愤怒着。黑暗在漫无边际地压过来。在给有恒先生的信中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但“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49]在欲说不能说之间,作者只有沉默或者不能将话说尽,但还是挣扎着想回忆一点什么,纪念一点什么。这也许

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逐渐逝去的过程,但人总希望给来者一点精神、心灵的慰藉、希望。“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50]“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51]“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实验,不敢邀请别人。”^[52]可看出鲁迅的思想与行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定的分离,也即鲁迅思想的超越性和行动的现实性。哲学意义上的虚无反应在现实中不一定就是死水一潭或者不能动弹。鲁迅不仅言语呈现着现实的犹疑,就是在语言上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话一说出,最怕的是自己“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其次鲁迅没有主义坚信,也就是他所说的不相信世间有一劳永逸的东西,所以说话行动不免迟疑。正是因为对所有的一切主义的不敢全信,所以他不敢做振臂一呼的英雄或者导师。即使是加入左联,鲁迅也是把它当作与国民党对抗的另一种文化组织来参加的,他对左联的专制作风看不惯,但他还是不希望左联在统一战线下解散,他是把它当作一个反抗的舞台,一个新兴的有未来有希望的组织来参加的。张宁在专著《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中详细地阐述了左联实际上存在的多种制度、文化发展可能,对于现在用结果推断过程,以整体代替局部,以绝对代替相对的学术观念和批评研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批评。^[53]

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认为其为《集外集》作的序似乎太热烈些,最好改得隐藏一点。他认为以文字结怨小人不值得,不想杨霁云因此结怨小人,而他把自己却说成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4]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担当意识,宁愿自己冒风险,也不愿别人受苦。在绍兴中学做学监时,学生派代表来问鲁迅,有辫子好还是没有辫子好?鲁迅回答说:“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55]因此鲁迅在学生之中落了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辫子没有了,脑袋也就有危险

了,鲁迅虽然自己剪掉了辫子,却因爱护学生生命不赞成他们剪辫,这也是一种被迫的言行不一吧。这是鲁迅对于当时黑暗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他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情况,使学生因剪辫而惹祸、落头,但他自己是坚定革命的志向,不畏惧生死的。

鲁迅希望他的话不要“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56]他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57]他从不打算自己的文字能够顽固留存,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文字他只当作是前进中的一草一木,构筑文明大厦的一砖一瓦,而不是金光闪耀、为了留世的伟大华美文章。鲁迅曾说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不赞成把《呐喊》编入中小学课本,怕的是教错了青年,对于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他只是为了履行好一个启蒙家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职责。

鲁迅同时又认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58]世界由愚人造成,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即读书人,读古书的聪明人,是做不成什么的。读书多自然想得更多,想得更多,错误与正确的界限会越来越不清晰,得失心也多,做事就缩手缩脚。鲁迅自己也曾解剖过自己,做不了领导者,凡事多疑虑。既表明了读书人的怯于行动,另一方面也表示鲁迅的犹疑思想,不想随意鼓动人们去作牺牲。从这点也可看出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在某些时候他渴望行动,但又迟疑于行动;颂扬行动精神,自己却又不敢轻易相信行动的正确与否。所以他嘲讽地说,与那些革命巨子比起来,“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59]但他天生不是革命家,对于那些看了他的文章挺身而出革命的青年,却感到“实在很苦痛”。不过,对于思想上的革命,鲁迅一直是坚定并身体力行的。

二、欲行动的思想

鲁迅一直崇尚一种可以让你动、你想动的思想。鲁迅的欲行动的思想可从两个方面来追溯:走出象牙之塔和出路的“可笑”;“呐喊”和做泥

土的工作。

(一)走出与出路

鲁迅鼓励青年走出象牙塔,在社会活动中做切实的事业。鲁迅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提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可见他对于行动的重视。鲁迅晚年仍坚持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60]鲁迅于1924年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等作品。“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61]鲁迅认为青年不能读死书,中国会因此沉寂下去,并且认为青年需有热血和诗意,民族才不会衰亡。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德国之所以不会衰亡,是因为德国民族有热血有诗意。他强调看书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62]“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63]并且“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64]读书是为了实践,实践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活书又可以使人想行动、想实践。所以鲁迅反对施蛰存提倡读《庄子》《文选》,他担心国民会重新沉入读古书的死寂和专做修辞的文饰中去。反对林语堂谈性灵、幽默,以及朱光潜论争静默之美和崇高之美,《新青年》时期反对胡适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都是鲁迅执着于现在执着于地上的表现。

“鲁迅的写作是一种道德行动和语言行动。”^[65]他要表达的是一种道德伦理,一种自己对生活的独立见解,用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去申辩去唤醒,去创造一个人心的、人性的道德空间。对于鲁迅来说,写作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一种需要,一种验证自己活着的倾说的形态。“作为一个‘执著于现在’,有着极强的现实感和实践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出路。”^[66]

鲁迅鼓励青年走出来,至于怎么走?他自己

其实也很迷茫。但他知道决不是中状元的路,也不是一些正人君子 and 所谓青年革命家所指的道路,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行动不断探索的过程。人类的文明不就是这样形成的么?“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67]“大量的木材”与“一小块”,这就是人类文明形成的悲烈的历史。我们付出了很多,可能才能获得文明的一丝进步。有时会走很多弯路错路,作出很多牺牲仍然一无所获。可是人类仍然要行动,要走路,去接近理想和真理,以此来验证活着意义,活着并且与命运作无限度的抗争。关于怎么走路,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经验之谈:走人生路有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一是穷途。遇见歧途,鲁迅说:“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68]另一种就是穷途,鲁迅主张“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69]说不定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路来。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行动的热衷,不管有路无路,反正就是走。一直在行走的动作,这就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永远在行走着的背影。直到晚年,他还在告诫自己说要“赶快做”。此外,鲁迅一生都坚持着反抗的战斗的行动的哲学。“对于现世的出路的怀疑和对于未来的光明的坚信在鲁迅身上交织,使鲁迅既与绝望抗争,又为了希望奋斗。而对绝望的抗争有时也是一种对希望的深沉的渴望。”^[70]

(二)“呐喊”和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呐喊倾向于外部的有影响力的行动,做泥土倾向于内部的默默无闻的铺垫工作。鲁迅用文字和演讲呐喊,也用生命来做泥土的工作,而且他经常劝年轻人做泥土的工作。

早在创办《新生》时期,鲁迅就着力翻译俄国和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据周作人回忆:“《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

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71]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鲁迅的故事:龚宝铨有一天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他的岳父章太炎手书的“邬波尼沙陀”五个字,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龚宝铨问周树人是否想翻译此两书,树人表示没有兴趣。他认为,这些宗教典籍虽然有助于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了解,但于国民性的改造却未必有所裨益。^[72]鲁迅说他之所以要译爱罗先珂的作品,“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73]在《〈奔流〉编校后记》中,鲁迅坦言热爱裴多菲是因为他的反抗俄皇亲临战场的爱国精神:“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补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74]文艺虽不是直接行动,却具有行动的意义。比如在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之争中,一些新兴的革命文学家认为鲁迅借文艺以革命不过是一种梦呓。钱杏邨说:“我们所见到的鲁迅,只有‘呐喊’式的革命,只有‘彷徨’式的革命。”^[75]在钱杏邨看来,呐喊、彷徨不是革命,革命是全身心地投入的一种庄严行动,与趣味、闲暇无关。在当时的革命文学思潮中,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自有其产生的国际国内思潮基础,不可一概抹杀。不过,“鲁迅对于事物的看法最为尊崇的还是自己的实感和独立思考。他

对于革命文学也有多重看法和一些不能确定的概念,创造社、太阳社对于革命的理解是政治活动,甚至连革命文艺都要服务于政治活动,而鲁迅更侧重于国民文化、根性上的启蒙革命。”〔76〕但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以行动来革命,来行人心或社会的改造。

鲁迅的呐喊遵循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77〕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和选择,不屈服于权力和金钱等,这才称得上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责任和担当的真正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鲁迅虽然自己感到的是黑暗和绝望,但他仍然希望给青年给人类以不悲观不绝望。“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78〕呐喊不但是为了做前驱者,也是为了慰藉那些流血的默默的隐痛的魂灵或者正在寂寞中前行的人们。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鲁迅是用一颗人类文明中的诗人之心对于那些默默前驱者的抚慰,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鲁迅作为前驱者的寂寞孤独和愿意作出的孤注一掷的牺牲。鲁迅希望能毁坏铁屋子,唤醒沉睡者,虽然又怕这唤醒让沉睡者更迷茫,但他又始终相信光亮的透入总比死水一潭更能带来民族和自我的新生。

在民族危难的时候,鲁迅更希望能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正地做一个民族的呐喊者、启蒙者。这个启蒙者是用鲜血、生命来承担自己的忧患和理想的。张承志把文学当作粗糙艺术,认为伪艺术只有在艰难困境中,才会从艺术的壳部剥落,伪艺术的作者才能成长为真正的艺术家。可看出,张承志倾向于赞同从行动中成就的真正的艺术。特别是那种艺术来自于生活、底层、最朴素的泥土,并且这种艺术带着人的血性、体温、屈辱的泪水。只有把自己的鲜血浇铸在里面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承志推崇鲁迅的原因。用行动哺育、成就艺术,像鲁迅那种把文学当作与刀和剑拼搏的血肉却又

不乏文学性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针对当时附和胡适等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崇拜创作”等主张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鲁迅提出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说。在左联成立大会后,鲁迅写信给川岛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79〕鲁迅一生就像是抚育青年的泥土。办杂志,当编辑,翻译外国文学,讲演,扶持青年作者等,都是鲁迅启蒙行动的一部分。加入左联后他虽知道左联人员芜杂,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共同目标的人做梯子,虽然这个目标对于鲁迅来说也只是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人类永远需要行动、实践来获得经验和真知,以让我们走得更好。

三、行走在路上的“过客”

(一)“我只得走”在路上

鲁迅是个关注现实、执着现在的现实主义者,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仅仅关注现实的生存是不够的,对于人的生存、存在的意义,鲁迅也有着深刻的思索。这并不会影响鲁迅的行动,对于虚无、生存的思考只会激起鲁迅用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行动来抗拒空虚和绝望,用生存中的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活着、存在着、奋斗着。鲁迅在行动上是以永不停歇地进取、行走来化解人生的终极意义状态“虚无”,虚无成为鲁迅人生中坚毅意志的对抗物。既然希望是虚妄的,绝望也是虚妄的,虚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虚妄。把生命融入其中,通过自己的赤膊、血肉作战,以此来验证生命的存在并非虚空。所以,鲁迅曾说,“一掷我身中的迟暮”,这种迟暮意识对于每个人来说时间都不同。也可以说,人一生中都处于一种与时间、虚无的意义赛跑、竞争的状态。即不屈服于自己的疲弱、对抗生命的衰老消失和来自于生命的无为、无聊状态。鲁迅在叫醒睡着的人们让他们感知到觉醒的苦痛和让他们继续着好梦之间犹豫了。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是浑浑

噩噩轻松愉快地做着欺骗自己的好梦,还是觉醒了,以一种奋然的姿态不倦地餐风露宿无惧野狼横野的前行。鲁迅无疑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人生方式,在《过客》中,过客既不要怜悯也不要爱,只是为了更无悔坚决地前行。鲁迅曾说过,人生中有一些爱会束缚自己,母亲的爱,爱人的爱。他拒绝温床,温暖,怕将他的心渐渐软化,会渐渐停行在爱人的臂弯里。鲁迅曾经引用裴多菲的话表示了自己对于艺术来自于苦恼的见解。“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80]同样,开拓者也只有在不平坦中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新路。

走哪一条路?鲁迅说不敢给青年指路。“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81]第一,鲁迅不敢确定哪一条路是好的,所以不敢指导青年。第二,他还在寻求,不是当时流行的那些主义理论,是别一样的道路,未曾经历过的道路。在《故乡》中,鲁迅也表示出了这样的思想,希望仍在,虽然希望的路还未显现,只要去走走,终会出现路的,那也有可能就是人们所要寻找的希望之路。所以他就用含糊或者“无所有”来回答寻路的人们,他也劝青年不要找导师寻路,“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81]当遇到歧途或穷途时,该怎么办?鲁迅建议:“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虽然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路,但鲁迅还是选择走的存在状态。只要在走,哪怕是在刺丛里走走,终归是在探索,是在走路,说不定就走出一条路来了。因为在鲁迅看来世上本没有一条谁定好了的完善正确之路。这也是符合鲁迅一贯一边走一边探索的精神的。所以,他从不给青年指路,因为他从不相信有真正设想好了的路只等着人们去走就可以,这和胡适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试图给中国提

出道路是不同的。可以说,鲁迅的道路是在行走中,一是行者的永远前行的“姿态”;其次,是行者践踏出的“道路”。这也许就是鲁迅对于人生存在状态和人类道路的一种阐释和设想。

不知道现在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出路在哪,鲁迅从未真正地乐观过。“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82]这区别于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要不,鲁迅就可以躲进象牙塔或全身而退了,更没必要奔波于革命文学的潮流中。廉价的乐观者决不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现实和人类历史的行程,鲁迅有着清醒理智的看法。他相信人类是乐天的、进步的,可他不相信有所谓的黄金世界,不相信未来的社会没有叛徒。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曾让他相信青年人一定胜于老年人,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可是历史、生活现实让鲁迅看到了进化论思想的盲目乐观,人心的幽暗的事实就像人类历史一样是会永远混杂着光明和黑暗的。

对于那个不准耶稣休息在他檐下而被诅咒,从此只能不停歇地走的 Ahasvar,鲁迅对于他没有慈悲心没有发言,倒是对于他的被诅咒感兴趣。这时候的 Ahasvar 估计在鲁迅心中有一点撒旦的意味了。鲁迅把 Ahasvar 的被诅咒当成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说,“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83]鲁迅把 Ahasvar 看作是一个自己找罪的人,这是很有意味的。Ahasvar 起初并不知自己要受罚,而鲁迅却把他写成一个乐于受罪的人,也可能正是 Ahasvar 的无意获罪,又正契合了鲁迅那种有些“自害”的脾气,所以,鲁迅就把 Ahasvar 看成是一个冥冥之中命定自己去担当什么的人物。鲁迅对于 Ahasvar 的“何以不安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84]这也可能就是鲁迅对自己生命状态的一种写照。鲁迅崇仰“异数”“恶声”,不相信多数的正义,更弃绝生命的舒适自安。

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鲁迅曾说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

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85]“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较为安适的生活。”^[86]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苦行僧般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简朴,更重要的是鲁迅怕安逸的生活腐蚀自己的意志,让工作被生活所累。鲁迅先生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活极致地简单化,全心去成就自己的启蒙事业。“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鲁迅先生潜意识里从不把任何地方当作自己的安乐窝,也不把家庭当作自我的温室,他是一个准备随时起身行走的人。就像他描写的过客,只是永不停歇地走,走就是他的使命。“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87]

过客“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这是一个准备自我牺牲永远承担的形象,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鲁迅的身影,而那个给过客揭示真理的老翁就像是另一个鲁迅。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都有这样把自己分成两个角色的安排,这正显示了鲁迅彷徨于无路的探路状态。“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88]过客生下来就是孤独的,就是一个人,没有亲人朋友,他的孤独是彻底的。鲁迅把过客推到一个彻底孤独的境地,让过客无牵无挂毫无顾忌地行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过客生来的孤独,他从不是合群的,也不是在多数的人群中,他甚至是一个人。他拒绝一切施舍,怕因自己得了布施而无法感激,或者因感激而停下了自己的脚步。鲁迅曾在给赵其文的信中写道:“我敢赠送你一句真实的话,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我的百无所成,就是受了这癖气的害,《语丝》上《过客》中说:‘这于你没有什么好处’,那‘这’字就是指‘感激’。”^[89]过客拒绝一切感激的负累,他怕他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90]

他也不想回到来的地方去,“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91]或者过客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过客可以在路上等死,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92]这仿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走就是他的职责,就是他的生命形态。过客的生命形态已与“走”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过客的生命存在一天,他就要以走的形态存在一天。这与 Ahasvar 必须狂走到最后一刻的生命形态是何其相似。可以说,Ahasvar 就是“走”的形式,他的生命就是走,当他不走时,他的生命肯定是死亡了。过客的命运也是如此,只要过客还有最后一口气,他就要在前方的呼唤声音中不停地走下去。当一个人承担受苦时,也就是他的身和心付出之时,也即是得到之时。只有无穷地付出,人才不会感到自己是无为空虚的,生命的意义也就在这种对抗中建立并充实起来。

(二)孤独、绝望与反抗

鲁迅本人就像一个永远在走着的人,一个明知前方是坟却仍然往前走的不屈服于命运的过客。鲁迅曾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93]当正人君子们手中握着“公理”,鲁迅知道他们背后是有政治势力的,他仍然说:“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94]虽反抗的结局“还在不可知之数”,但还要“试他一试”,他不会屈服于权势,更不想公理、正义被权势强夺,处于逆境中的鲁迅这时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95]这即预示着鲁迅的决绝的反抗。没有朋友,枭蛇鬼怪他都愿认作朋友,如果连这个也没有,“我一个人也行”。这是一个立志要反抗到底的战士准备对毁谤、轻蔑、孤独等的一系列的承担。许广平也为他的这种决绝担忧。她曾在之前的信中就感到鲁迅的危机要爆发了,她把它叫作他的“反抗的脾气”“不被攻击固然要做,被攻击就愈要做的。”^[96]鲁迅曾说过:“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

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97]鲁迅也意识到自己所走之路的孤独和艰难,但是他准备倾尽一生来走这条寂寞的反抗之路。明知是绝望,却偏要反抗它,比明知是希望而去追求它,更需要勇猛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

极致的孤独是一种绝望的处境。鲁迅希望从身外去寻求青春、希望,以证明自己还在这人间活着,以弃绝虚妄的袭击。他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98]然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青年们很平安”。他一直都希望青年们能走出来,而他自己也表示过要闹一闹的意思。就连青年也不会理解鲁迅。在这篇《希望》写后不久,熊以谦写了一篇《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是针对鲁迅的“青年必读书”的:“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胡闹,就是横闯吧!”^[99]连青年都认为鲁迅是胡闹,可想社会的腐朽、反动势力的牢固强大。鲁迅反驳道:“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100]世间沉寂着,“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101]用希望的盾来抗拒空虚中的暗夜的到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102]但是鲁迅仍然坚持“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03]《希望》与其说是在追寻希望,倒不如说是一首斗士之歌。鲁迅把希望当作需要去战斗才能得到的东西。战斗即等于希望,行动才能证明生存着。为了验证生存的实在,必得每时每刻地战斗。当身外是如此寂静时,鲁迅感到了难以

回避的寂寞。世上的青年都老了吗?为什么唯有我,一个头发已经白了、手在颤抖着的人还在渴望着战斗?鲁迅的一生就是战斗的动态的一生,他需要不断地发出声音来验证自己的存在,他需要不断地警醒世人生存就是一场反抗奴役和压迫的斗争。

鲁迅永远在绝望与虚妄之间挣扎前行,虽然希望是渺茫的,这世上没有止于至善的黄金世界,就像对于革命的前途,他也只是在寻求另一种更好的民众的生存方式。他不相信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性的东西。那些认为是“老人的胡闹”的看法,是对于鲁迅一直在寻求真理,渴望行动的战斗品格的不理解。比起那些什么也不信也不行动的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或者不敢有丝毫改变的守旧者,鲁迅一直在履行着反抗和寻求的职责。张宁认为鲁迅“在信仰的位置上置放了绝望和虚无,同时又拒绝了绝望和虚无,以一种绝望和希望、虚无与实有之间的张力状态,形成了一种东方式的独特的精神景观”。^[104]

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写道:“求生就是他的渴求,然而意义是没有的,意义就是一个单纯的活着。可是活着究竟是痛苦,一面看到前途是黯淡无光,一面又觉得现实不能使自己满足,找不着出路,又不愿堕落,这结果只有狂喊几声,彷徨歧路了。”^[105]这段话形象地刻画了鲁迅“活着”的状态。“单纯的活着”,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人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活着是为了“活着”,可是要活着,却是要挺受很多,如悲欢离合,生死诀别,伤心欲绝,无望无聊无奈等。但是人还要活,人类还要存在,“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106]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挺立,就是一种对生命的坚韧承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活着”的存在形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过客必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样。“找不到出路”,毕竟鲁迅“又不愿堕落”,所以鲁迅只有“狂喊”“彷徨歧路”了,好一幅过客的画像。毕竟始终在狂喊,在彷徨,而不是不思不动,鲁迅的思考

也是过客的另一动形式。

当希望是那么渺茫时,有时把希望都抛弃,让自己置于无可选择没有退路的绝望之境,那时,反而有一种立于天地空旷间的把重负全背负又全部卸下的自由。绝境反抗之后就是希望,希望往往是在反抗之后形成。没有面临绝境的反戈一击,就不会有希望的现身;只有把黑暗捣毁之后,才会有光明透过。

人生对于鲁迅虽然包含着空虚的绝望,但鲁迅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虚无、悲观主义者。对终极人生意义的领悟对于鲁迅来说只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任何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人生终极意义时没有一个不是悲观的,从这一点来说,宁可把鲁迅看成一个最坚韧的人生实践者,一个面对人生的绝望仍然执着地向前走的人生意义的实践者,也即是一个乐观的肉搏者。比起那些躲在象牙塔里的居士以及干脆隐没起来对社会不管不问的隐士型知识分子,鲁迅更显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本身的意义。不管是受排斥批判还是横站受敌,这对于鲁迅来说,都是显示他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与这个社会的不调和表现出的反抗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就是鲁迅永远批判、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现代知识分子品格。唯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社会才会是前进的,充满生机和乐天的。

注释:

-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2][3][5][14][24][2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2、13、14、13、31页。以下《鲁迅全集》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4][日]内山完造:《诗的对话》,《鲁迅研究资料》,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供内部参考),1977年,第42页。
 [6]鲁迅:《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第403页。
 [7][83][8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71、170、170页。
 [8][9]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10][11]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陈漱渝主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9、172页。

- [12][60]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13][16][17][33][41][58][82]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301、299-300、301、302、300页。
 [15]鲁迅:《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20页。
 [18]胡适:《编辑后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1页。原载《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
 [19]唐棣:《记鲁迅先生》,子通主编:《鲁迅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20]鲁迅:《“好政府主义”》,《鲁迅全集》(第4卷),第248页。
 [21]鲁迅:《“音乐”?》,《鲁迅全集》(第7卷),第56页。
 [2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3页。
 [23]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25]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7页。
 [26]鲁迅:《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44页。
 [27]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04页。
 [28]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245页。
 [30]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第168页。
 [31]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5卷),第123页。
 [32]鲁迅:《反“漫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484页。
 [34][38]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35][37][56]鲁迅:《“公理”之所在》,《鲁迅全集》(第3卷),第514-515、514、514页。
 [36]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6页。
 [39]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40]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399页。
 [42]“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言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参见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页。鲁迅所谓的先前沉默的原因如果主要意在欲不搅入人事纠纷中,那么现在的沉默即在对政治以及青年的信念的轰毁,或者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怀疑。
 [43][49]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477页。
 [44][45]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3、33-34页。
 [46]鲁迅:《330301·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237页。
 [47]鲁迅:《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67页。

[48]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80页。

[50][59]鲁迅:《通信(并Y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101、99页。

[51][52]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80页。

[53]这是一本研究鲁迅与左翼关系的有着很多闪光点的书,在其书里,体现了当代学术最缺乏的一种相对性的可贵批评实践。就像竹内好“用‘文学鲁迅’来概括鲁迅的一生,张宁该著也体现着竹内好或者说鲁迅看待、阐释事物的思维方式。在悖论的纠葛中呈现事物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使人们得到一种欣赏阐释不尽的名著的快乐。学术更多是一种创作,也就是让历史、事实回心的过程,经过内心的体验、反刍变成自己的血肉,就成为内在于自己的观点了,这种观点一旦形成,就成为自己认识、处理事物的思维方式。

[54]鲁迅:《341223·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9页。

[5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95页。

[57]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08页。

[61]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75页。

[62][63][64]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462、463、462页。

[65]姜异新:《“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4期。

[66]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67]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93页。

[68][69]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16页。

[70][76]胡梅仙:《行动者的鲁迅之“欲行动的思想”》,《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71]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72]参见林贤治:《人间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

[73]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37页。

[74]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97页。

[75]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

编:《鲁迅围剿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原载《我们》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

[77]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7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79]鲁迅:《30032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226页。

[8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3页。

[81]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8页。

[85][86]孙伏园:《忆鲁迅先生》,于通主编:《鲁迅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87][88][90][91][92]鲁迅:《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9、194、197、196、196页。

[89]鲁迅:《250408·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2页。

[93]鲁迅:《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7-478页。

[94]鲁迅:《两地书·一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页。

[95]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9页。

[96]许广平:《两地书·一一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8页。

[97]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2页。

[98][101][102][103]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181、181、182页。

[99]鲁迅:《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鲁迅全集》(第7卷),第268页。

[100]鲁迅:《报〈奇哉所谓……〉》,《鲁迅全集》(第7卷),第264页。

[104]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05]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

[106]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89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